

分类号：
学号：20232004022

密级：请注明密级及保密期限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国家在场：入疆手工艺人的技术共享实践与“新 社会”的形塑（1949-1966） ——基于新疆民间美术的历史考察

学位申请人	张婉蓉
指导教师	李钦曾 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艺术学、学术学位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美术学
研究方向	民族民间美术研究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
2026年5月

分类号：
学号：20232004022

密级：请注明密级及保密期限
单位代码：10759

石河子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国家在场：入疆手工艺人的技术共享实践与“新 社会”的形塑（1949-1966） ——基于新疆民间美术的历史考察

学位申请人	张婉蓉
指导教师	李钦曾 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艺术学、学术学位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美术学
研究方向	民族民间美术研究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
2026年5月

**State Presence: Technical Sharing Practices of Craftsmen in
Xinjiang and the Shaping of a "New Society" (1949–1966) —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Folk Art in Xinjiang**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Shihez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Art Studies

By

Zhang Wanrong

(Ethnic and Folk Art)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Prof. Li Qinzeng

May, 2026

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研究生签名：

张婉璐

时间： 2026 年 6 月 1 日

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石河子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在学校图书馆保存并允许被查阅。有权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学位论文编入有关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研究生签名：

张婉璐

时间： 2026 年 6 月 1 日

导师签名：

李钦曾

时间： 2026 年 6 月 1 日

摘要

1949年至1966年，在国家力量的系统性介入下，一批来自内地的手工艺人进入新疆，他们的技术实践与社会参与深刻重塑了新疆手工业的生产形态、社会结构与文化认同。本论文以“国家在场”为视角，对这一时期入疆手工艺人的群体构成、技术实践及其社会成效展开历史考察，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手工业产业形态滞后、技术体系封闭及从业者边缘化的困境，手工艺因其兼具经济、社会与文化多重属性，成为契合国家边疆战略与地方发展需求的独特媒介。在国家有组织的动员与选派机制下，以张亨德等为代表的专业手工艺人入疆，他们不仅是技术资本的携带者，更成为连接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的能动媒介。这一“国家嵌入”的过程体现为三个维度的系统性改造：在组织层面，合作化运动以生产小组和合作社的形式，将分散的传统作坊整合为集体协作网络；在技术层面，标准化推广与新技术引入带来了深刻变革，以1955年七一棉纺织厂产出新疆首块机械印花布为标志，实现了从原料输出向本地加工的跨越；在文化层面，图案革新实现了政治符号与民族纹样的有机融合，技艺融合催生了跨地域的技术交流与创新，社会主义美学通过日常生活媒介广泛传播。师徒关系从宗法性传承转向制度化生产，技艺的跨地域交流催生了国家技术与地方知识的创造性融合。这一双向互动最终将新疆手工艺从传统民间状态，有机整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经济与文化体系之中。

本论文为当代“文化润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历史注脚。手工艺人的角色实现了从经济赋能到文化铸魂的演进，手工艺的功能从经济商品拓展为文化符号，实践模式从技术单向输入转向文化的双向滋养。从阿勒泰“户儿家”文化大院中见证多民族互助的马鞍与粮票，到当代传承人融合天山风光、十二木卡姆与杨柳青年画技艺的创新实践等，均生动体现了手工艺作为情感联结与文化认同载体的历史延续，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国家在场；入疆手工艺人；技术实践；新社会重塑；新疆民间美术

Abstract

Between 1949 and 1966, under the systematic intervention of state power, a cohort of craftsmen from inland China entered Xinjiang. Their technical practices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profoundly reshaped the production patterns, soci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of Xinjiang's handicraft industry. Employing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presence," this paper conducts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group composition, technical practices, and social outcomes of these craftsmen during this period.

Confronted with the predicaments of Xinjiang's handicraft industr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characterized by backward industrial forms, closed technical systems, and marginalized practitioners—handicrafts, with their unique attributes spanning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became a distinctive medium aligned with both national frontier strategi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needs. Through the state's organized mobilization and selection mechanisms, professional craftsmen represented by figures such as Zhang Hengde entered Xinjiang. They served not merely as carriers of technical capital but as active agents connecting state will with local practice. This process of "state embedding" manifested as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organizationally,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tegrated dispersed traditional workshops into collective collaboration networks through production teams and cooperatives; technically, the promotion of standardiz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marked by the July 1st Cotton Textile Mill's production of Xinjiang's first mechanically printed fabric in 1955, achieving the leap from raw material export to local processing; culturally, pattern innovation achieve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olitical symbols with ethnic motifs, technical fusion fostered cross-regional technical exchange and innovation, and socialist aesthetics spread widely through the medium of everyday life. The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shifted from patriarchal inheritance to institutionalized production, while cross-regional technical exchange catalyzed creative fusion between national technology and local knowledge. This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ultimately integrated Xinjiang's handicrafts from their traditional folk state into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 of a socialist modern nation-state.

This paper provides historical annotation for contemporary initiatives of "cultural nourishment of Xinji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role of craftsmen evolved from economic empowerment to cultural soul-forging, the function of handicrafts expanded from economic commodities to cultural symbols, and the practice model shifted from unidirectional

nal technical input to bidirectional cultural nourishment. From the horse saddles and grain coupons witnessing multi-ethnic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Hu'er Family" cultural courtyard in Altay, to contemporary inheritors' innovative practices fusing Tianshan landscapes, Twelve Muqam, and Yangliuqing New Year painting techniques, all vividly demonstrate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of handicrafts as vehicles of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s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in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state presence; artisans moving to Xinjiang; technical practices; new social reshaping; Xinjiang's folk art;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2
(一) 研究背景	2
(二) 缘起	2
二、研究现状评述	4
(一) 新疆民族手工艺研究	4
(二) 入疆人才群体的专题研究	5
(三) 手工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	6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8
(一) 研究目的	8
(二) 研究意义	8
第一章 新疆手工艺与新中国的边疆战略	19
第一节 国家战略下的新疆手工艺生产	19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的社会整合与政治秩序巩固的战略需求	19
二、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与新疆手工艺生产恢复与发展	21
三、中华文化认同与新疆手工艺生产的战略需求	23
四、手工艺之于边疆：国家战略视角下的多重价值	2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手工艺的发展困境	25
一、碎片式的传统工艺产业格局	26
二、封闭的手工技艺体系	26
三、濒临破产的手工艺人	27
四、边缘化的政治处境：手工艺人的生存与发展窘境	29
小结	29
第二章 入疆手工艺人的群体构成、选派机制与技术特征	31
第一节 群体谱系：入疆手工艺人的来源与构成	31

一、地域来源：支援省市分布与地域工艺特色的关联	31
二、社会背景：年龄、教育程度与从业经历的群体特征	33
三、技术层次：技术情况与工艺门类的分布格局	36
第二节 动员与派遣：入疆手工艺人的选派机制与过程	38
一、政策驱动：从宏观战略到具体指令	39
二、选拔与重塑：政治的可靠性与技术能力的双重归准	40
三、组织流程：从动员、报名到派遣安置的全过程	42
四、个体响应：入疆意愿的形成与入疆手工艺人的能动选择	43
第三节 技术媒介：入疆手工艺人的技艺构成与优势潜能	45
一、技术门类：体系化工艺知识的植入	46
二、技术水准：先进性的权力话语	47
三、技术理念：国家意识形态的嵌入	47
小结	48
第三章 手工艺作为国家力量的嵌入及其成效	50
第一节 技术移植与产业重塑	50
一、组织之变：新型合作化生产组织的建立	50
二、技术之革：标准化与新技术推广中的效率变革	55
三、市场之拓：从“土产”到“商品”的流通体系初建	57
第二节 社会网络与新秩序构建	58
一、师徒关系：从宗教传承到生产制度	59
二、合作社生产：集体化劳动与日常秩序	61
三、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供销关系	61
第三节 文化交融与中华文化认同成效	62
一、图案革新：政治元素与民族纹样的融合	62
二、技艺融合：跨地域交流与标准化生产	67
三、社会主义美学的确立	69
小结	71
第四章 对文化润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启示	73
第一节 手工艺人在文化整合中的角色定位	73
一、从“经济赋能”到“文化铸魂”的手工艺定位变迁	73
二、手工艺从“经济商品”到“文化符号”的功能演进	74

三、从“技术单向输入”到“文化双向滋养”的实践模式	77
第二节 入疆手工艺人才制度对当下新疆手工艺发展的镜鉴	77
一、现代手工艺人才引入与留存机制的构建	77
二、基于本土主体性的创造性传承模式	78
三、手工艺价值实现与产业升级的路径	80
第三节 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历史注脚	83
一、手工艺品作为“一体多元”格局的物质载体	83
二、手工艺合作组织作为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平台	83
三、手工艺传承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肌理	84
小结	84
结论	86
参考文献	89
一、著作	89
二、期刊论文	90
三、学位论文	91
四、报纸	91
五、电子文献	91
六、其他	93
致谢	94
作者简介	96
导师评阅表	97

绪论

1949年至1966年，是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的十七年。在这段被史学界称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的历史阶段，新生的人民政权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与政策实践，将国家力量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新疆，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国家的在场，无论是通过政权建设、经济改造，还是文化整合都深刻地改变了这片土地上的社会与文化。

本研究聚焦于1949-1966年间入疆的手工艺人，及其技术实践与“新社会”形塑之间的内在关联。这里的入疆手工艺人，既包括响应国家号召从内地支边援疆的汉族工匠，也包括在本土范围内流动、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族艺人。他们携带的不仅是各自的技术，更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生产方式。当这些手工艺人汇聚于新疆，在国家力量的主导下共同劳动、交流技艺、重建生活，他们的技术实践便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活动，成为“新社会”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研究选择民间美术诸门类作为历史考察的具体领域，因为民族民间美术不仅是技艺的载体，更是文化的表征。在传统社会中，民间美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信仰仪式、审美趣味深度嵌合，承载着地方性知识与族群记忆。当这些传统技艺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框架，它们的功能、形态与意义必然发生深刻转变。考察这一转变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力量如何通过技术实践重塑社会关系，以及手工艺人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既被塑造又主动参与“新社会”的构建。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在1949-1966年“国家在场”的历史语境中，入疆手工艺人的技术实践如何参与新疆“新社会”的形塑，换句话说，国家力量如何进入手工艺人的技术实践，手工艺人又是怎样在技术实践中回应、协商乃至重塑国家意志的，民间美术诸门类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功能与形态转变，以及这些转变对理解当代文化润疆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何种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一）研究背景

现有关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66）的研究，多集中于宏大的政治运动、经济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宣传。然而，国家的顶层设计如何在一个地理遥远、文化多元的边疆社会“落地”，其具体的、微观的实践机制仍有待深入挖掘。本论文将“国家在场”视为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而非静态的结构存在。选择“手工艺人——那些从内地奔赴新疆，将青春与才华奉献给边疆建设的手工艺人”及其“技术实践”作为观察窗口，正是为了从社会活动的角度，去揭示国家力量如何通过改造生产方式、重组社会关系、塑造审美趣味，来实现对边疆社会的深度整合与重塑。

传统手工艺史研究常局限于器物美学、技艺传承与匠作谱系，存在“见物不见人，见技不见社”的局限。尽管近年来艺术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但其焦点多集中于精英艺术或内地民间工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手工艺所承载的复杂社会功能关注不足。与此同时，关于新疆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又往往被置于民族民间美术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框架下，在强调了其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却相对遮蔽了其在特定历史关头作为国家战略一环的政治与经济属性。本论文旨在跨越这一裂隙，将新疆手工艺置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中，考察其从一种传统的、地域性的生计方式，向国家化的、集体主义的生产与文化建设事业的转型。

技术不仅是生产力，更是一种治理工具和权力媒介。新中国初期对边疆的治理，是一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技术改造。组织手工艺人入疆，推广新技艺、新标准、新组织模式，本质上是一场以技术为名的社会手术。它试图通过最具体、最日常的生产活动，将国家的权威、秩序与意识形态编码进边疆社会的肌体。这一过程充满了国家技术与地方知识的碰撞、协商与融合，为理解新中国如何处理一体性与多元性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极其宝贵而又被长期忽视的历史案例。

（二）缘起

本论文的缘起，源自笔者在石河子大学学习过程中，对艺术生产中“人才流动”与“文化润疆”这一核心命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空白所产生的学术兴趣。在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艺术移民或者说是艺术支边群体是一

个不应被忽视的独特存在。他们可以说是与古代行旅的文人画家、近代留洋归国的艺术学子一样，都是文化传播与变迁的重要载体。然而，与后者相比，1949-1966年间入疆的手工艺人才，其动机、身份、使命与创作语境都极具时代特色。他们身上交织着个人理想与国家使命、主流艺术范式与地方民族风格的多重因素。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的聚焦，揭示在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力量如何引导艺术人才的流动，而这种流动又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区域性美术风貌的生成与演变。他们的故事，是理解社会主义初期中国美术生产机制的一把钥匙。

1949—1966年，是新中国在新疆奠定政治基础、重构经济体系、培育新型文化认同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宏大图景中，一批批内地手工艺人的入疆，绝非偶然或孤立的技术援助事件。它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国家战略考量：手工艺因其兼具经济赋能、社会组织与文化塑形等多重功能，成为国家嵌入边疆、摆脱其发展困境的理想媒介。本论文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力量是如何通过手工艺人的具体技术实践来实现其对边疆社会的经济再造、社会重构与文化引导，这一“自上而下”的嵌入过程，又如何能在“自下而上”的层面与新疆本土的现代社会文化发生互动，最终形成一种双向的塑造？回答这些问题，是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一种细腻解读。

当前，文化润疆作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旨在通过文化的力量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这一战略的实践，需要深厚的历史视野作为支撑。本论文聚焦的1949—1966年，正可以视为一场早期的、以手工艺为载体的文化润疆先声实践。那段历史中关于技术移植与地方创新、集体组织与个体能动性、社会主义美学与民族传统形式的探索与经验，对于今天思考如何实现有效的文化浸润、如何激活手工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积极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镜鉴价值。本论文因此不仅是面向过去的史学钩沉，更是带着强烈现实关怀的理论思考，旨在为理解当代新疆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脉络，提供一份坚实而深刻的历史注脚。

作为一名民族民间方向美术学研究生，笔者始终对边疆地区丰富多元的艺术形态抱有浓厚的学术热忱。新疆，作为中西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其艺术所蕴含的混杂性与生命力，极具研究价值。选择1949—1966年内地入疆手工艺人才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希望将宏观的历史背景与微观的艺术实践相结合，以一个具体而微的切入点，切入新疆现代美术史这一广阔而迷人的领域。笔者相信，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亦能为我们今天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遗产、艺术交流与民族认同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

综上所述，本论文试图穿越宏观历史的表层，潜入由手工艺、合作社、图案革新与

日常交往构成的微观世界，去聆听一场由国家主导、却由无数普通手工艺人与本地民众共同参演的社会重塑的交响曲。这不仅是对一段尘封艺术史的重述，更是通过技术实践这一面镜子，展现新中国国家建构逻辑的一次生动诠释。

二、研究现状评述

本论文所涉领域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即关联新疆民族民间手工艺研究，又涉及到手工艺人才群体研究，还与国家边疆治理议题相关。为系统把握既有成果，本论文将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与评述。

（一）新疆民族手工艺研究

新疆民族手工艺的本体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工艺特征、历史变迁与产品类型等方面。仲应学依托清代史料对各手工业行业的产量与数量进行统计，以扎实的史料整理为后续研究奠定了重要数据基础。^①厉声、许建英将近代以来新疆艺术的发展划分为晚清、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期，对各艺术种类的演变进行了概括性梳理，虽提及徐庶之等内地入疆艺术家，但未展开深入分析。^②贾应逸、李文瑛、张亨德从历史学、考古学与工艺美术学视角系统考察新疆地毯的发展历程，指出生产技艺的改革是新疆地毯发展的关键^③，值得注意的是，张亨德本人即内地入疆手工艺人，其个人经历为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线索。李安宁通过实地考察与史料整理提出“丝绸之路沉淀—融合论”，强调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地区的独特贡献。^④李钦曾对新疆地毯“开力肯”图案的伊朗来源、“阿娜尔古丽”地毯创始人的考证，以及对维吾尔族建筑装饰艺术吸收外来文化元素的分析，揭示了新疆民间美术的包容性与创新精神。^⑤王利中从经济史视角将手工业作为新疆工业发展的环节加以论述，肯定传统手工艺在现代工业变迁中的价值。^⑥方红萱系统考察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新疆少数

^① 仲应学.新疆手工业概述[J].新疆地方志,1992,(03).

^② 厉声,许建英.近代以来新疆艺术述论(1840-1999)[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

^③ 贾应逸,李文瑛,张亨德.新疆地毯[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

^④ 李安宁.新疆民族民间美术(上)[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⑤ 李钦曾.新疆少数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5.

^⑥ 王利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疆工业变迁研究[J],西北大学,2010.

民族手工业的变迁历程，注意到国家对民族手工业的政策扶持，提出“党和国家的正确政策是新疆民族手工业健康发展的保证”^①，为本研究理解“国家在场”提供了经济史维度的印证。

上述研究为本论文提供了厚实的史料基础和类型学参照，但若以手工艺人为观察中心，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研究重心呈现明显的重物轻人倾向。无论是贾应逸对地毯纹样的考辨，还是李安宁对融合论的阐发，其核心关切都是物品的形态与源流，手工艺人往往仅作为工艺的载体被附带提及，其主体性、能动性及其社会生命历程严重遮蔽于文本背后。并且，研究范式受限于传统器物学与经济学视角。方红萱虽触及政策扶持，但仍将手工艺人仅仅视为产业要素，未能深入揭示手艺人社会结构变迁中的角色重塑。现有成果虽隐含了国家的影子，但尚未将“国家在场”作为一个自觉的分析框架，去审视国家意志如何通过技术共享实践重塑手艺人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这为本研究从技术共享实践切入、考察手工艺人在“新社会”形塑中的主体角色留下了关键的学术空间。

（二）入疆人才群体的专题研究

随着学术视野从“物”向“人”的转移，新疆入疆人才群体开始受到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美术领域。中国美协新疆分会、新疆画院编撰的《新疆美术家》以个人小传形式介绍了部分艺术家的经历与作品，为个案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②黎蕾在《新疆美术概说》中虽提及部分艺术家，但仅止于简要介绍，其关于“有思想深度、有学术分量和在艺术上有突破的精品、力作并不多见”的判断，虽显严苛，却也提示了该领域研究的薄弱状态。^③康书增首次明确将支边美术人才作为群体加以关注，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美院青年毕业生及工人、研究人才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支边新疆，使“这片美术荒漠在短时间内聚集了一大批艺术人才”。^④段保国、张桥、李钦曾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支边大学生画家与兵团早期美术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

^① 方红萱.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新疆少数民族手工业变迁研究[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3.

^② 中国美协新疆分会、新疆画院.新疆美术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③ 黎蕾.新疆美术概说[J].艺术导刊,1996,(1).

^④ 康书增.建国后支边新疆美术家研究[J].美术观察,2010(11).

探讨,将群体研究与地域美术史相结合,为本论文提供了方法论参照。^①孙利对新疆美术教育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重点研究不同时期有突出贡献的美术教育工作者,关注其教学方法与艺术作品,并探讨他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②为理解入疆人才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实证案例。左红卫在新疆民间美术研究综述中明确指出,现有研究“较少涉及民间美术的传承人研究”,呼吁“多视角对新疆民间美术的研究”,^③这一判断精准揭示了既有研究的薄弱环节。

人才群体研究实现了学术视线从物向人的转移,但人的范畴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局限。研究对象集中于精英画家而忽略了大众手艺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具有学院背景、取得显著艺术成就的支边画家,而同期大量入疆的、掌握实用技艺的刺绣、地毯、金属工艺等手艺人,因其匠人身份长期处于学术视野的边缘甚至盲区,其作为技术实践主体的独特性未被充分认识。研究取向偏重艺术成就而疏于社会功能分析。现有成果多致力于总结入疆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历史贡献,属于艺术史内部书写,而对于这些人才群体如何作为国家治理的媒介、其技术实践如何参与边疆社会整合等议题缺乏深入探讨。实际上,手艺人与画家虽同属艺术人才,但其生产方式、服务对象及与国家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不能简单套用既有结论。这为本研究从技术共享实践切入、考察手工艺人在“新社会”形塑中的主体角色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空间。

(三) 手工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研究

在手工艺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多以间接方式呈现,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探讨。谈玉婷从民族特需用品政策研究切入,指出“民族特需品是民族地区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④该观点注意到手工艺与民族团结的关联,但分析停留于政策层面。李钦曾新近出版的《新疆少数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研究》从发展现状、产业平台、政策机制等维度展开系统论述,将手工艺置于产业发展框架下,注意到政策环境对产业的影响。^⑤石河子大学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近年来开展的研培项目,初步探讨了手工艺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指出石榴纹、鹿角纹等典型纹样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

^① 段保国,张桥,李钦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边大学生画家与兵团早期美术发展[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② 孙利.建国以来新疆有突出贡献的美术教育工作者的调查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

^③ 左红卫.新疆民间美术研究综述[J].新疆艺术(汉文),2017,(03)

^④ 谈玉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特需品供给政策调整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04).

^⑤ 李钦曾.新疆少数民族手工艺产业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5.